

THE END OF THE AVANT-GARDE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 先锋的终结

比较文化研究

王昶  
CHANG WA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END OF THE AVANT-GARDE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 先锋的终结

比较文化研究

王昶

CHANG WA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锋的终结:比较文化研究/王昶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4

ISBN 978 - 7 - 301 - 20274 - 6

I. ①先… II. ①王… III. ①比较文化 - 研究 IV. ①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6786 号

感谢北京艾美迪营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出版资助

书 名: 先锋的终结——比较文化研究

著作责任者: 王 昶 著(译)

组 稿 编 辑: 杨书澜

责 任 编 辑: 魏冬峰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301 - 20274 - 6/1 · 2444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电 子 邮 箱: [weidf02@sina.com](mailto:weidf02@sina.com)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9 印张 277 千字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此书献给我的外祖父——周波(1923—2009)

丛菊两开他日泪  
孤舟一系故园心

——杜甫

*Ognuno sta solo sul cuor della terra  
trafitto da un raggio di sole;  
ed è subito sera*

——Salvatore Quasimodo

# 目 录

## 告 别 革 命

文化市场,庶民政治与先锋的终结

- 达里奥·福事件(北京)个案研究 ..... 3
- 达里奥·福:他与历史 ..... 20
- 政治正确与达里奥·福 ..... 38
- 谁怕达里奥·福 ..... 40
- 1968年5月,或,为我叹息 ..... 42
- 1968年5月:戈达尔,电影,事件 ..... 51

## 读 书

- 英语世界的中国电影研究 ..... 61
- 面向21世纪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 ..... 65
- 作为文学的电影剧本的形式与内容 ..... 71
- 结构主义洗礼之后的问题
- 兼评雷蒙德·威廉斯《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 ..... 79
- 理解艺术史
- 阅读《1940年以来的艺术:存在的策略》 ..... 84
- 放逐诗学与《时间简史》 ..... 88
- 生之疲乏
- 读解布列松《普拉杜大街》 ..... 91
- 性别童话和游戏主义
- 阅读《玫瑰床榻》 ..... 95

法律,眉批,历史	
——美国判例法中的中国和华人 .....	109
明州最高法院壁画上的孔子 .....	123
范式是否可以通约?	
——比较中美法律和法律信息 .....	129

## 电 影 史

费德里柯·费里尼 .....	145
帕索里尼传奇 .....	152
长别离 .....	158
为我叹息 .....	160
暧昧的日本与黑泽明 .....	162
好莱坞电影的历史与现实 .....	165
误读之用	
——美国编剧协会罢工和中国编剧界的“响应” .....	173

## 呼喊与细语

共 谋	
——民族国家电影的救赎策略 .....	183
主流与边缘的辩证 .....	187
异 端 .....	194
贩卖一无所有 .....	196
谁怕大众文化 .....	198
我们聪明伶俐,我们谈情说爱 .....	200
在后现代看电影 .....	202
缸中之脑 .....	205

## 对 话 录

- 胡作非为  
——关于 INVASION 和“非常影像”与颜磊的谈话 ..... 209
- 通俗文化与知识分子  
——与楼肇明对话 ..... 213
- 生活就是一场战争与下一场战争之间的休战  
——与弗兰切斯科·罗西对话 ..... 223

## 翻 译

- 电影理论中被忽视的现象学传统 ..... 233
- 民族电影史的文化研究 ..... 243
- 商品拜物教之镜  
——让·鲍德里亚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 ..... 261
- 终结之感  
——基耶斯洛夫斯基《三色》读解 ..... 273
- 20 世纪美国艺术  
——以克里斯托为个案 ..... 285



# 告 别 革 命



## 文化市场,庶民政治与先锋的终结

### ——达里奥·福事件(北京)个案研究

“商业文学”是人民—民族文学的一个分支,其“商业性”根源于这样的事实:它的“有趣的”成分不是“真挚的”、“内在的”,无法同艺术观和谐地融合,它是呆板地从外界搜寻得来,作为保证“一鸣惊人”的成分,用巧妙的方法炮制而成。然而,这至少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即便是商业文学,在文化史上也不应该被忽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甚至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一部商业性文学作品的成就,表明了(有时是唯一的标志)“时代哲学”是怎样的哲学,即在“沉默的”群众中间什么样的感情和世界观现在占据主导地位。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科学时代的戏剧能够将辩证法变为一种乐事。事物合乎逻辑的迅猛或者跳跃式的发展带给

们的惊喜,一切境况的不稳定性,事物的矛盾性中蕴涵的机智,诸如此类,这些就是人类旺盛活力的种种娱乐。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都上升为生活的艺术和生活的快乐。

一切艺术都是为了——一种最伟大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

——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世纪末的狂喜与忧惧互相渗透,伴随着股市的涨落、电脑“千年虫”和病毒问题的烦扰、城市空气的日形污浊和燥热的身体交流,在无数的后现代滚滚人潮中弥漫着一种莫可名状的非真实感,这是一幅我

---

\* 转引自《葛兰西论文学》,吕同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们可以命名为“超大真实”(hyper-reality)的虚拟世界图景。在此,“千禧年效应”与“末日感”轮流坐庄,统治着世人的情感天地。但是,在这样描绘我们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现实的时候,我们是在“事实”(facts)和“真相”(truth)之间作着字谜游戏,言不尽意,意在言外。

每一位当代文化的观察者都在努力切近“真相”:在表象和真实之间,好像确有空间可以任观察者作语词的嬉戏,然而,当代社会文化现实的乖谬和无理性,它的多维度和多层面的异质杂糅往往给人以顾此失彼之感。“堂皇叙事”早已失效,对当下历史的线性梳理似乎是一种僭越,而对文化问题进行个案研究的方法似乎又太容易堕入历史主义的泥沼:进入一个“事件”,意味着首先命名一个“事件”。而“事件”在什么意义上曾经发生,在什么意义上不曾发生,均取决于观察者研究方法初始参数的设定方法。在文化研究领域,海森堡“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永远是观察者无法逃脱的梦魇。另外,当下现实的不不断变化,新材料的层出不穷也往往令研究工作长久地处于物理量的累积状态,解构主义的名言“一个小小的注释瓦解了全文论述”成为对任何综合、整理尝试的警告。如果说对一个“事件”的观察即是一种“介入”,那么,这种“介入”在何种程度上将造成对分析结果的预设?悖谬的是,对文化现实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的并陈和辨析也同样存在“预设性”的危险和重构话语范型之嫌。那么,文化研究工作者是否应该在当代文化的现实空间、虚拟空间和话语空间之间游走,以流变不居的品格来最低程度上地质询现实、探查“真相”呢?

当代通俗/大众文化研究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将是否定的。

毋庸讳言,对现实的观察即是对现实的发言,文化研究的方法将是一种姿态和立场,不断的辩证和颠覆是对任何一种文化话语霸权和建制化倾向的高度警惕,批评文本同创作文本一样是“敞开的文本”(海德格尔),观察和分析永远是“在路上”、未完成的,它们或许只是“现实生活的渐近线”,永远不可能接触到那“真相”。但思想在立体的空间中不断地运动和冲撞,哪怕最终结果可能还是折返回“源始”(beginning),那也将表明我们从来未曾恭顺和安详地接受被建制所委派的“自由选择”和“自我定位”。

话语层面和社会活动层面展现出来的诸多元素在多大程度上可

以被命名为“事件”？把话语层面的“事件”与可见的社会活动层面的“事件”进行并置和共议的合理性何在？个体生命体验和审美利害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干扰甚至否定了客观观察的可能？这些都是观察者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求解将贯穿于批评文本之中，但不可能最终除尽、得解。

199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意大利戏剧家达里奥·福(Dario Fo)以及他的话剧作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在当代中国内地的文化现实中曾经扮演了什么角色？能够扮演什么角色？尽管这样那样的“角色”和“文化事件”可能不过是观察者话语的一番“大虚构”，但那却是观察者并非急于澄清的问题。

## I

1997年10月9日，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宣布将199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意大利戏剧家、演员达里奥·福，称“他在贬斥权威并维护受压迫者尊严的喜剧创作中继承了中世纪丑角的精神”。消息在北京时间晚间公布，于是，依据惯例，翌日清晨，新华社驻瑞典记者编写了新闻“专电”通稿，在中国的主要官方传媒上播发。同样依据惯例，中国的官方和文化传媒依据得奖作家的国别来寻找“专家”（即中国主要学术机构中该国文学研究的权威人物），以求获得进一步的背景资料。<sup>①</sup>与对待前两年的两位文学奖得主比起来，大陆传媒对达里奥·福的反应要略显热情一些，报刊上陆续出现了短篇

---

<sup>①</sup> 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意大利文学协会会长吕同六语：“……9日晚始，笔者居所铃声不断，纷纷打听达里奥·福何许人也。”《出乎意料，合乎情理》，《环球时报》1997年10月17日。同版刊发了英美文学专家董鼎山的介绍文章《一位讽刺剧作家的荣誉》，因为英语传媒捕捉世界热点新闻的速度是极快的，所以稔熟英语的专家也可以为传媒提供可靠信息。另外由于互联网等高科技传播手段的存在，中国主要传媒的值班记者们基本与欧美传媒同时得到消息，记者们一般将立即开始工作：组织稿件、编写报道。而普通中国民众尽管在第二日会得知获奖作家的名字和国别，但至少要一周左右才会从文字传媒上获取一些背景知识。

介绍,一些主要的文学艺术报纸也组织了专稿或专版。<sup>①</sup>

事实上,只有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在当代中国民众文化生活和当代中国文化现实中才具有了意义。漓江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尽管从80年代起就广为发行<sup>②</sup>,但文学圈和大学外的普通民众对诺贝尔获奖者的名字还是相当陌生的。<sup>③</sup>而90年代,特别是1993年以后,由于出版业的繁荣和大量

① 例《文学报》在第957期编发了关于达里奥·福的“专稿特稿”,《中华读书报》也有小型专版,《中华读书报》随后还首先刊发了达里奥·福作品的节译,刊发出来的文字(《美洲传教记》片段)是从互联网上下载的英文片段的中译。

1993年中国全面推进市场化策略之后,文化热点和文化事件一直是传媒报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文化新闻。那么,最具有轰动性的事件就应该是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电影奖、世界三大电影节、格莱美音乐奖等。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1994年得主大江健三郎因为均是小说家,所以拨动了传媒和出版业的极大热情。介绍文章甚多,而得奖者的主要作品译本均有出版。但是,中国传媒对托妮·莫里森作为重要的黑人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几乎一无所知,也由于中国文学圈对欧美60年代以来的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的陌生,造成了译介莫里森作品时的尴尬:语境的匮乏造成了接受的困难,文学爱好者似乎很难从莫里森小说中读到“精彩的故事”和“重大历史事件”。与莫里森相比起来,出版界对大江健三郎作品的推出要更加卖力:1996年初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江健三郎作品集”(5种)开印册数为3万,且均有再版,随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大江健三郎最新作品集”(5种)当时在坊间、书摊也随处可见。但尽管传媒、出版业对大江热情甚高(甚至大江有一个弱智儿子也成为传媒报端频频加以报道的新闻),但普通民众对大江艰涩、思辨的作品感到难以消化。10种大江作品的单行本在再版后均滞销,到1999年上半年各大书店仍有存书。而漓江出版社于1997年12月出版的《个人的体验: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印数只有3500册,可以视为出版业对民众失望情绪的反应。1995年得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和1996年得主波兰诗人维斯瓦娃·申博尔斯卡恰巧又是“曲高和寡”的诗人,大陆传媒均低调处理。直到1997年底达里奥·福得奖,他是戏剧家、演员,又是来自文学大国意大利,大陆传媒自然要热情一些。

② 漓江出版社的这套丛书在大陆文学爱好者圈中权威度甚高,编辑和译笔水准均被认为高于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陈映真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集》(1982),后一套书曾被中国出版印刷业大规模盗版,精装和平装盗版本在90年代初的中国外文书店中随处可见。

③ 据笔者在北京市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80年代以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一般民众中的知名度相当低,有相当数量的被访者把中国官方意识形态部门推荐的“家庭书架”中的外国文学名家(巴尔扎克、高尔基等)指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80年代文化热的影响下,具有大学知识背景的文学爱好者虽然对诺贝尔文学奖具有相当的认识,比如知道这是一个20世纪的文学奖,颁奖者为瑞典皇家学院,但仍没有一个人能全部数出80年代十来位得奖者姓名和国籍。而1992年以后进入大学文科学业学习的被访者已经基本列出1992年以后获奖者的姓名、国籍和身份(诗人或小说家)。有趣的是,全部被访者的六成可以说出大部分90年代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片名。90年代中国内地民众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降温伴随着对奥斯卡电影奖的升温。

报刊文化副刊的出现,每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宣布与颁奖都成为报刊的一条重要新闻。伴随着 80 年代以来对中国作家何时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诺贝尔文学奖及最新得主在大陆民众心目中已具有较高知名度。<sup>①</sup> 达里奥·福的获奖在传媒工作者那里的意义首先在于:作为一位意大利戏剧家的他得奖是一件大新闻,而他获奖在意大利国内引起的广泛争议和反对之声也是中国内地文化传媒工作者乐于听到的,这将是一件新闻的不断推陈出新,与新闻的“喜新厌旧”品格极为吻合,于是,对达里奥·福的介绍能够持续了相当的时段,直至 1998 年中。<sup>②</sup>

每年度诺贝尔奖得主的国籍身份在中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那里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哪一个国家的作家获奖,对中国该国文学研究者们来说都是一件盛事。1989 年西班牙小说家卡米洛·何塞·塞拉获奖,1990 年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获奖,令整个中国西班牙语文学研究界精神大振,这被认为是向文学爱好者以及普通民众们推介西班牙语文学的大好时机。<sup>③</sup> 同样,达里奥·福获奖消息传来,中国内地意大利语文学工作者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兴奋,类似于得知本国体育代表团在外得胜一样的感情。中国内地的意大利语文学研究界相对于其他西方主要语种文学研究界来说相当薄弱,

---

① 中国文学界和传媒对中国作家能否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但主流传媒有意无意地避免出现海外呼声最高的中国诗人北岛的名字,在报道和介绍时多以分析和回顾为主,时或大力推荐巴金老人,时或混淆史实:称鲁迅先生曾拒领诺贝尔文学奖。(鲁迅先生曾拒绝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② 在例行公事的得奖者介绍之后,大陆传媒又深入报道了对达里奥·福获奖的争议。12 月 10 日,授奖典礼上,达里奥·福“别开生面”的 25 页漫画演讲又一次刺激了海内外传媒界的兴奋点。参见《文学报》第 957 期专版、《环球时报》1998 年 1 月 4 日文化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别出心裁:讲学与众不同》以及上海三联《书城》杂志 1998 年第 5 期的“达里奥·福专题”(吕同六编译):《诺贝尔奖流向文学社会之外》、《“桂冠”授予“小丑”》、《别开生面的“演讲词”》等等。

③ 1982 年哥伦比亚小说家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奖后,云南人民出版社于 1987 年开始组织大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学界专家们大规模译介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文学作品,出版发行。这套以“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命名的大型文学丛书被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丛书在 90 年代初开始再版,至 1995 年前后销量一直相当不错。

纯语言教学人员的比例高于其他语种学界。<sup>①</sup> 普通民众对意大利文学的无知是令意大利文学研究者们甚感无奈的事实,当代意大利作家除了伊达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和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外,鲜有人知。达里奥·福是历史上第六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大利作家,但前几次获奖均已时过境迁<sup>②</sup>,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意大利文学研究起步以来,达里奥·福是第一位获奖的意大利作家。所以,意大利语专业文学研究者们理所当然地重视这一新闻。在专业文学刊物和学术刊物上开始出现了研究和译介文章。<sup>③</sup> 但是,在1997年10月以前,中国内地意大利语学界对达里奥·福基本上没有任何介绍,许多专业语言文学工作者同普通民众一样,也是首次听到这个名字。<sup>④</sup> 随着介绍材料的发表和更多信息传来,意大利语言文学研究界以及更广泛范围的外国文学研究界更感到了困惑:达里奥·福实在与“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相距太远,他的艺术太世俗、太不纯粹。这是一位地道的游吟歌者,一位丑角和民间艺人,他是世俗的、甚至是粗俗的。90年代

---

① 中国意大利语文学研究界最高机构为中国意大利文学研究会,它不是官方正式研究机构。只有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上海外语学院几个大学中设有意大利语本科专业,以培养语言交流人才为主。

② 前五位获奖者是:乔苏埃·卡尔杜齐(Giosue Carducci),诗人,1906年获奖;格拉齐亚·黛莱达(Grazia Deledda),小说家,1926年获奖;路易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戏剧家,1934年获奖;萨尔瓦多莱·夸西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诗人,1959年获奖;尤金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诗人,1975年获奖。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世界文学杂志社和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动态》(双月刊)1997年第6期发表吕同六的《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坛奇才达里奥·福》和菁华的《以戏剧作投枪的一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意大利剧作家、演员达里奥·福》;1998年第1期、第3期发表王昶的《达里奥·福:他与历史》;《读书》杂志1998年第4期发表黄灿然的《达里奥·福获奖引起的争议》;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主编的,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外国文学译介刊物《世界文学》1998年第4期编辑了“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作品小辑”,发表达里奥·福剧作专著《演员基本手册》选译(王焕宝译)、《达里奥·福创作活动年表》(王昶编译)和介绍文章《现代民间文学大师》(吴正仪)。

④ 中国出版的几种意大利文学史均未曾有只字论及达里奥·福:如沈萼梅、刘锡荣编著的《意大利当代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张世华著《意大利文学史》,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同样,尽管达里奥·福的喜剧剧本集从1962年就开始出版,他的《喜剧全集》自1966年至1988年已出八卷,英文版《福戏剧全集》自1992年也开始出版,但在达里奥·福获奖时,他的作品还没有任何中文译本。事实上,在此之前,只有吕同六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上为福撰写了一个条目,另在戏剧界的专业著作中偶有论及。



中国内地的文学明星是“文人中的主人”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他那睿智、机敏、深沉的谜一样的文本似乎才是“真正”的文学。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和公正性在专业文学研究者圈子内部是很少有人质疑的,“并不是每一位应该得奖的伟大作家都得了奖,但差不多所有得奖作家都应该得奖”基本已成为专业圈内共识,那么,如何将达里奥·福纳入既存的意大利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脉络之中,如何在学术主流话语体系中收编、安放达里奥·福,将是专业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授给他奖?”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授予达里奥·福以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皇家学院的文学委员们在90年代秉承“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路线的合理选择,同时,命名和确认先锋、革命事件无疑是主流文化建制招安和纳降的策略,把先锋和革命事件放入历史,写成文学论文,使其成为“空洞的能指”和话语系统中“在场的缺席”,而静静地等待先锋的终结。<sup>①</sup>另外,达里奥·福激进的庶民政治立场和高扬的革命斗志,以及他对中国“文革”的严厉批判态度<sup>②</sup>都令意大利语言文学工作者们倍感麻烦,达里奥·福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家,他与资产阶级政权和法统终生保持鲜明的对抗,但是他不是正统的左派,他与意大利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关系不和,凡此种种,均成为学习、尊敬和研究这位文学大师的干扰。但无论如何,文学家的地位已经确立,对他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内地的文化传媒和专业外国文学刊物在介绍、研究达里奥·福时,均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他的妻子,剧作家和演员弗兰卡·拉梅(Franca Rame)的重要地位。拉梅是达里奥·福终生的创作和演出伴

---

<sup>①</sup> “The End of Avant-Garde”(先锋的终结), Pier Paolo Pasolini(帕索里尼)作,见 *Pier Paolo Pasolini: The Poetics of Heresy*, Beverly Allen 编, Anma Libri 1982 年版。《谁怕达里奥·福》,王昶作,《文艺报》1998 年 11 月 19 日“艺术”版。

<sup>②</sup> 1975 年,达里奥·福夫妇以旅游者身份访问中国,对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极其厌恶,他们回国后创作了寓言剧《老虎的故事》,讽刺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该剧于 1979 年在米兰上演。1989 年在罗马复演。后经香港民众剧社改编为木偶剧,于 1991 年在香港街头巡回演出数十场。